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七

回首依旧赤子情

——天津归侨口述录

主编 林晓东 张秀明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回首依旧赤子情

——天津归侨口述录

林晓东 张秀明 主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首依旧赤子情: 天津归侨口述录/林晓东, 张秀明主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80222 - 307 - 3

I. 回… II. ①林…②张… III. 归国华侨—生平事迹—天津市
IV. K828.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2227 号

回首依旧赤子情——天津归侨口述录

编 者/林晓东 张秀明

责任编辑/励 慧 郭岭松

版式设计/宝蕾元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张/12.5 字数/210 千

印 刷/北京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2 - 307 - 3/Z · 12

定 价/2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序

中国是一个海外侨胞众多的国家，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谋求生计、创基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华侨华人关心着祖（籍）国的强盛与进步，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中国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展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华侨华人团结互助、艰苦创业的奋斗史，有利于了解他们对居住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就史，有利于了解他们爱国爱乡，为祖（籍）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与当地人民和睦相

处、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史；而且更有利于我国总结开展侨务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了解华侨华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侨务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提供参考和借鉴，更有针对性地为华侨华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以推进侨务工作向前发展。

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就国外而言，华侨华人问题作为一个与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相关的移民问题，于20世纪初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密切合作，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和相互的联系，更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成为热点研究的问题。就国内而言，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发展、繁荣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体现了四个特点：一是研究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年轻一代专家学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崭露头角，为研究带来兴旺的景象；二是新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协作更加密切；三是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文章和著作数量繁多，研究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四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

缚，更加注重现实侨情的研究，而且广泛涉及到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人口等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研究的趋势。

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在历任学会领导和历届侨联负责同志、侨界前辈的关心支持下，学会的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进展，不仅发挥了全国性侨史研究学术团体组织协调的龙头作用，而且推进了地方历史学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资料收集、研究编撰、著书立说等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较好地发挥了侨史研究“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21世纪以来，随着华侨华人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华侨华人的研究。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旨在为海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供展示研究成果的阵地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采访老归侨，征集、出版老归侨口述历史是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两年前开展的一项重要规划，这项规划得到了中国侨联林兆枢主席和各位副主席的关心和支持。目前，已在山西、天津和广西进行了采访活动。《回首依旧赤子情——天津归侨口述录》是中国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所开展的老归侨采访活动的首批成果。该书记录了四十位老归侨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们大多是建国初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归侨。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老归侨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劳刻苦，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热情和力量。他们奋斗在各行各业，其中既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有普通工人；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有全国劳模和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是广大归侨的杰出代表。为了真实记录他们的心路历程，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宣传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将本书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七》出版。

在此，我衷心希望：《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的问世，有利于将华侨华人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林明江

2007年2月

目 录

“蔡院长是华侨，软硬不吃！”	蔡天益	/1
为了美好的明天继续前行	陈阿乐	/12
我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陈亨	/22
我与新中国测量专业的开拓	陈健	/32
一切为了天津电讯事业的发展	陈堃喜	/39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华侨	符之华	/48
追求理想，无悔人生	高砥	/58
与祖国理化科研事业共成长	何炳林 陈茹玉	/62
一生也不会后悔的选择	何洁虹	/82
华侨和教师身份是一种荣誉	何稚冲	/91
为国家做事情，有动力！	胡振邦	/104
报效祖国志不移	黄其兴	/116
为侨服务是我一生的出发点和愿望	蒋派锦	/133
堂堂正正一生，清清白白一世	李钊明	/142
文艺理论现“春晖”	李哲明	/155
在国内同样能发挥自己的专长	廖永武	/161

为人民军队教研事业贡献力量	林道苑	/174
搞技术革新才能出效率	林德时	/182
我曾经帮陈弼臣做过事	林圣灿	/188
对于祖国我问心无愧	凌敬之	/197
报效祖国，无怨无悔	刘乾隆	/209
平凡的人与平凡的事	卢汀	/218
乐为中马民间交流做点事	罗伯良	/237
不忘祖国培养，一生教书育人	潘菊芬	/253
值得骄傲的三十载农机科研路	钱国良	/261
革命者与教师身份的切换	苏良才	/271
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培养 ...	唐南龙 温婉美	/276
气象工作是我的生命	肖淑招	/285
回国实现了上大学的愿望	谢丽芬	/291
耕耘在中医药学的沃土上	徐振文	/299
愿为祖国做一点事情	杨益三	/314
爱国是华侨的本能	张福昆 邹远辉	/321
祖国是我医学生涯的开端	张同庆	/336
当人大代表真不容易	张杏霜	/343
功勋章上有妻子的一半功劳	郑天林	/349
党和人民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	郑振妙	/362
我是一名普通的干部	朱辉祥	/371
后记		/386

“蔡院长是华侨，软硬不吃！”

——蔡天益

被采访者简介：蔡天益，男，1931年5月出生于福建晋江，后侨居印尼。1951年回国升学，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大学工作，曾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1993年退休。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21日

采访地点：天津市天津大学四季村被采访人住所

采访者：黄小坚 郭刚 郑斌华 陈小云

整理者：黄小坚

(一)

我是福建晋江人，从小在那里长大的。我们家是侨眷家庭，我与妹妹、妈妈全靠爸爸从印尼洒水寄来的侨汇生活，原本日子过得还可以。

我对日本人特别的仇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我们家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极为艰难，靠变卖家当过日子。我失学了，自幼便开始干家务、替母亲分担家庭负担，童年

生活过得相当凄惨。

抗战结束后，父亲寄来了大量侨汇，我又复学了。不久，货币不断贬值，加上苛捐杂税多，钱还是不够用。但无论如何，我们家的侨汇是村里最多的。

“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有钱的人家难免被歹人盯上。一天，国民党军队来村里抓壮丁，本来我是独子不需要当兵的，但还是被强行抓走了，要家里人出钱赎我出来。妈妈闻讯后急得要命，哭哭啼啼地赶往集中关押壮丁的学校，打算花钱赎我出来。不曾想，我对那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趁看管的人不留意，就从后门偷跑了。



蔡天益在接受采访

眼看着家乡社会险恶、日子没法过了，妈妈忍不住就给爸爸写了信，希望把我们接走。1948年春，我们全家三口人终于跑到印尼与父亲团聚了。

父亲在泗水做生意，与别人合股开了旅馆、菜馆、油米店，还有一个卖罐头的食品店，规模都不大，但经营得还可以，于是我和妹妹分别进入当地的中、小学继续读书。当时初到南洋的孩子有幸上学的还真是“独此一家”，其他同龄人一般都是去当学徒做工的。

我上的是泗水新华中学。这是一所左派人士办的学校，学校董事长是我远房的叔公。在那里，我刻苦读书，把数理化功课补了起来。学校老师常常偷偷地塞进一两篇新华社电讯或《新华月报》上的文章作为语文课的教材，我自己在课余时间也私下阅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等，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和熏陶。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了中国有个共产党，他们正在东北打大仗，并且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动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深植在我心中的爱国思想迅速成长起来。此前，新中董事长、我的老叔公曾回过老家，后来又经香港、天津到北平看望早年奔赴延安抗日的儿子，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回到印尼后，他对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满怀希望，很快就把四个儿子、女儿都送回国去学习。其子蔡希孔回国后在哈工大学习，后来留下工作，现在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他的影响下，我也产生了回国上学和建设、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

但是，我的想法和愿望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希望我继承他的产业。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就这样斗争了一

年，还是没有结果。

这时，我父亲的老朋友许可帮了我一把。他是个进步文化人，与胡愈之曾经是同事。他帮我做通了父亲的思想工作。我爸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也无可奈何，便提出条件让我回国。临行之前，许可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让我回国后面递胡愈之。

(二)

就这样，我在 1951 年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北京。

到达北京后，我最先在育英中学落脚，参加北京市侨联在那里为归侨学生举办的一个补习班。育英中学当时条件很差，睡的是木板床，臭虫很多，晚上常常被咬得睡不着觉。不久，燕京大学办了个华侨先修班，我们在育英中学补习的一百多位侨生都转过去了。

我们在燕京大学那里呆了两年。燕大对我们华侨学生很照顾，学习上、生活上都安排得很好。我还记得，当时教地理的老师是侯仁之先生，教社会发展史的是雷洁琼同志，还有很多知名的老师给我们讲授各门课程。他们给我们这些小华侨补习课程，可谓下足了工夫。记得当时赶上运动，燕大校长的女儿在会上揭竿而起，批判她老爸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经过这场运动，我思想上也受到了洗礼，进步很快。进校后第二年的五四青年节时，我就光荣地入了团，并在南北

阁前的草坪广场上宣了誓。

有了如此正规的系统学习，考大学就顺利了。我们全班同学有五人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五人之中，现在已经有两位在香港去世了，一个仍然在香港定居，一个女生留校，还有一个就是我。全班三十个同学中，也有少数同学没有坚持下来，又回到原侨居地。经过淘汰，最后就只剩下二十三人了。

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汽车、拖拉机专业。清华大学不愧是中国名校，大师云集。记得那时钱伟长教我们物理课，每次他上课时，教室后面都挤满了旁听的人，他们多是来自八大院校的青年教师。平时，学校很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大跃进”时，我到北京内燃机总厂去搞井冈山小汽车的研制。我是车身组组长，带了十五六个同学，还配有一组工人师傅。干了半个学期，就真的把车开到了中南海报喜。此外，学校还很注重学生的实习。我就曾两次到了北大荒苏联援助的大农场实习，第三次的毕业实习去的是拖拉机研究所。当时，校领导蒋南翔曾提出“8150”口号，要求学生们一天当中要勤奋学习八小时，体育锻炼一小时，以实现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口号，还真正落实了，图书馆到时间便关门闭馆，赶你出去锻炼身体。

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1958年，我顺利完成学业，毕业了。我的学习成绩中不溜儿。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是各系统、各单位的中坚，有个同学还当上了中国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

遗憾的是，无论我在清华是如何地争取进步，结果就是人不了党。党课学习班我参加了一期又一期，自己都成了老学员了。后来参加工作，单位信任、重用我，甚至让我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队长，但这入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在组织问题上从不动摇，派性斗争从不掺和。直到打倒了“四人帮”，从北京来了个新的党委书记，问为什么蔡某不能入党，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这都是“海外关系”惹的事儿。

(三)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津大学工作。当时天津大学也搞汽车，因此我到天大（按：“天大”即天津大学的简称）后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并被委以重任——搞“红与专小汽车”，具体负责底盘与传动部分。我带着十几个人，奋战了一个多月，便赶在当年国庆节时开到北京报喜去了，只比“井冈山小汽车”晚了半年。

后来天大不搞汽车了，让我到力学系去当助教。正式上课前，不仅要看指定的专业书，参加寒、暑假考试，还要进行试讲。材料力学是天大的基础必修课，每年都有一千七百—一千八百个学生要听课，我顺利地承担了这门课程十几年的教学秘书。

但是，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里，也有那么几拨学生的

课，费了我好大的劲儿。如教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工农调干班”，教留学生，难度都很大。留学生中差别很大，越南学生很用功，朝鲜学生也行，罗马尼亚学生因回国后要与留学欧美的学生一同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分配工作，学习积极性也很高。最难教的是蒙古学生和非洲的黑人学生。特别是非洲学生，他们只认识《人民日报》字体的字，抽象思维差。有鉴于此，我在教学上采用“三多”的方法，即多重重复重点内容，多举例说明，多画图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个非洲黑人学生，拿着“文明棍”进教室，上课了还不起立，出入都前呼后拥的。后来了解到，他们是他们国家那里的贵族，是个有着尊贵身份的“头儿”。经过多番“较量”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我把这个学生连同其他黑人学生都给顺过来了。最后他们也认可了我，一有什么活动就会想到我。拿“文明棍”的那个学生回国当上了工程师，后来还回到天大来读研究生呢！

除了教学外，我也搞过科研项目。我曾经带着一帮工农兵学员做研制铲车的课题，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挑头做的项目。搞了半年，从设计到测试，都由我负责。有



蔡天益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

一次不小心、铲车失去平衡，后轮离开了地面，差点儿出了人命。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成果出来了，很多兄弟单位的人都跑到我做课题的工厂去要原始材料。

另外，我很早就开始了专业领域的转向，尝试利用工科的理论和技術去研究一些生物力学的现象。我跟天津市骨科医院等单位合作，研究人体生物力学、固体生物力学，即人体骨骼断裂后的愈合问题，后来还成立了生物力学研究所，好几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现在这个研究所成了硕士点。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很多人不适应。我们到广西弄了一个死人的大腿回来做实验，实验员说吃不下饭、不想干了。我们送出去培养的人才，也不回来了。结果，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萎缩了，重庆大学那边生物力学研究却发展起来了，还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当然，要论自己做出的业绩，还是在研究生院工作期间最突出。

我是在1984年出任天大研究生院培养处处长的（后来升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短短几年，研究生数就从二三百人升至六百余人。当时全国只成立了二十二个研究生院，天大的规模排在第二梯队，仅次于北大、清华。除了吃、住由学校管以外，其他全归院里管。院里下设招生、学位、培养、办公室四个处（后增加了研究生政治思想工作处）。尤其是课程很多，管理起来很复杂。国家要求，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学位课程要占三分之二，而这些课程都要求设在二级学